

海峡两岸  
唐代文学  
研究史

1949 ~ 2000

◎ 陈友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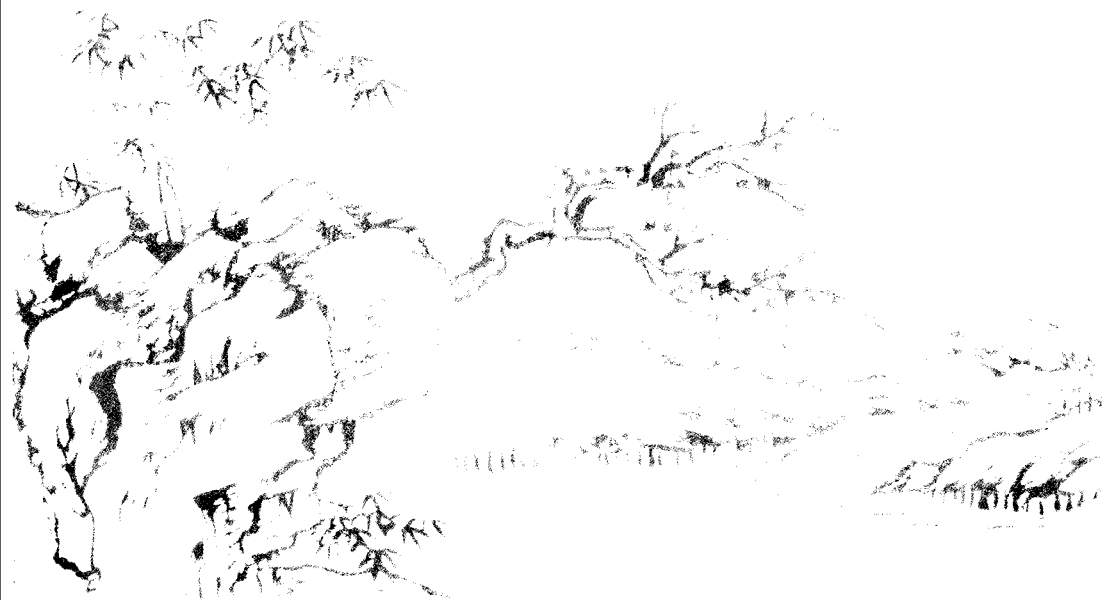


◎ 陈友冰 著

海峡两岸  
唐代文学  
研究史

1949 ~ 2000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1949~2000)

陈友冰 著

责任编辑:赵明节 赵运仕

封面设计:张 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c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90×1 240 1/32

印张:16.125

字数:464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 - 5633 - 3562 - 5/I · 381

定价:48.00 元

# 序 一

傅璇琮

去冬今春,我分别在北京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刊物上读到过陈友冰先生的两篇专文,即关于近50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以及台湾学界唐代文学研究述论。现在我有幸在正式出版前通阅全书,不期有两种心情,一是感谢,二是钦敬,油然而生。我想这不单是大陆学者,就是台湾学者,也会与我有同感的。

所谓感谢,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对新世纪学术研究来说,信息量将是促进发展、提高品位的重要因素,谁在这方面做得富有成效,谁就将居于先行者之列。近5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唐代文学研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海峡两岸信息互不相通,极为隔膜,对学术研究十分不利。现在通过陈友冰先生的这部专著,我们海峡两岸的学者,都能对对方的学术行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眼光豁然开朗,胸襟顿然宽畅。没有陈友冰先生这几年的沉潜操作,这种境界我们是达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学人一种传统的铭感之情。

所谓钦敬,有两层意思。一是陈友冰先生这样做,为研究者提供查获资料的方便,这实是一种奉献。现在大陆学者中有一种趋向,就是即使搞唐代一个朝代文学的,专业领域也越来越细,搞诗的不关心文、赋,更不问及传奇小说,做初盛唐的不关心中晚唐,因此关于唐代文学研究整体进展情况,就不很

清楚。我想,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就可以通过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和利用较多和有用的知识资料,从而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我曾经提到过,我们一些前辈学者,常常是自己动手编制资料书和工具书。如陈援庵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有深厚基础和精湛修养的史学家,他撰写过多种著作,但也编过好几部工具书,如《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释氏疑年录》。台湾老一辈学者如严耕望先生编著有《唐仆尚丞郎表》,现在的罗联添先生编有《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续编。这些切实有用之书,实际上是浸融着一种可贵的学术奉献精神的确使人钦佩。

我所说的钦敬之情的另一层意思,是陈友冰先生的识力。本书不是一般的学术报导,而是一种学术通论。如记述大陆50年的研究进程,无论是1949~1965期间,还是“文革”后,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创新时期,在提供大量的客观的资料之余,总要加以评论,对台湾的几个时期,也是如此。特别是第三章《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充分肯定两岸学者的成就和各自的优势,就在比较中显示彼此的消长,而在具体评述中又适当指出两岸在某些领域各有所不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世界上的事业是要靠一种热情才能做成的,但我们研究历史,一种较高的层次,即哲学历史,就要有“理性”,他明确地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北京三联书店王造时译本,1956)。这倒能启人思索。陈友冰先生是大陆安徽学者,现在担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有一定行政职务,近几年他又到台湾作学术访问,结识台湾南北各地的不少学者,交情不浅。但他仍能对两岸彼此的学术做出自己的评论,这就不仅需有热情,更要有学术上的一种“理性”。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对古今学术史“应具了解之同情”。就是说,了解作为同情的前提,同情又作为了解的趋向,由此就可

以达成一种超越于狭隘功利是非的通识。通过本书的阅读，两岸学者确可达到“同情的了解”，就是说，既彼此了解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又增进彼此的交流与情谊。陈友冰先生这样做，其意义已经超越于一本几百页的书了。

近50年来，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其总体成就确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对这一有特色的学术领域，作一种学术史的探索，陈友冰先生此书确是一部创新之作。我们研讨学术史，不能只局限于古代，在新世纪全球化发展的新环境中，应当把视野拓展到现当代，这样才能使我们更贴近社会，建设一个有科学内涵的现代学科。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就不详作介绍，读者通阅之后，所得一定比我还多。我这里想再谈谈一些个人感想。

台湾学者同行，我最早熟识的是罗联添先生和杨承祖先生。10年前，我曾有一文介绍罗先生的《韩愈研究》及《唐代文学论集》，刊于1992年的《中国典籍与文化》创刊号。罗先生后来嘱其高足撰文，介绍我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刊于台湾《汉学研究》上，自此就开始了我们深切的学术交流。1980年代中期，我邀约二十几位唐代文学研究同行做《唐才子传校笺》，《唐才子传》卷四王季友传，其中说：“家贫卖屐，好事者多携酒就之。”后世多以此作为王季友的事迹。其实这是本于杜甫为王季友所写的《可叹》诗“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杨承祖先生曾有《杜诗用事后人误为史实例》一文（刊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3），文中指出杜诗这里并非写实，而是变用谢承《后汉书·刘勤传》。我曾有机会读到此文，觉得所考新奇而又可信，就举以告作此传笺证的山西大学储仲君教授。按照通例，我们做笺证凡引用现代成果的应注明出处，但限于当时情况，未注明。后我于1990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见到杨先生，向他谈起此事，他听了甚为欣然，此后就开始了我们切磋学问的交谊。

1999年下半年,我应新竹清华大学之邀,去该校中文系教学一学期,同时又至台北、台中、台南等地大学、研究机构讲学,因此认识的学者友人更多,除与我年龄相若的如汪中、阮廷瑜、罗宗涛、王寿南等几位教授外,还有差不多二十几位中青年学界杰出人才。这样,我对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学风有具体亲切的了解。陈友冰先生书中谈及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的特色和优长,其中有“海外资料比较丰富,学术资讯比较灵通”,我确有同感。我感到台湾文史学界对大陆的学术成果是很关切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他们的论文中总要引录不少大陆的专著与论文。我在教课中,有时出题让学生做一些专题报告,他(她)们所交的读书小结,首先是列出与题目有关的大陆方面的成果,真使我惊异。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具体成果却了解得很不够。如我在1970年代后期写有《韦应物系年考证》,刊于《文史》第五辑(1979),现从陈友冰先生书中,得知罗联添先生于1969年已发表有《韦应物事迹系年》。又如我在1982年底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1984年出版,此书主要从文化背景,通过科举考试,探讨唐代士人的生活与心态以及文学风气,但对考试文体却涉及不多。现得知台湾王梦鸥先生有《晚唐举业与诗赋格样》(《东方杂志》16卷9期,1983),罗联添先生有《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的开始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7期,1985),张正体先生有《唐代科举制度与诗赋体制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20卷1期,1987)。这对进一步了解唐代科举考试及文体沿革就很有参考价值。

我有一个想法,前50年,大部分时间由于情况壅隔,彼此不通,对研究确有不利的方面。但事情也有另一面的,即由于上述情况,对台湾来说,却形成、保持自己独有的治学风尚,这倒是值得思考的。总的说来,台湾的治学风尚,似乎与传统学风更接近一些,这对我们上年岁的人来说,似乎更有一种亲

切感。陈友冰先生书中所说的台湾学术著作“选题细密，能小中见大”，以及台湾学者对诗歌格律颇有研究，且能写出古诗美文，似均与此有关。进入新世纪，两岸学术交流将进一步发展，我相信，彼此必能更好发扬各自优势与特有的治学风尚，携手共进。

陈友冰先生在第四章《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与前瞻》中，对唐代文学学科建设提出很有见解的建议，我很赞同。我以为，特别是现在，我们更应进一步扩展视野，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把海峡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以唐代文学来说，我们应研究唐诗、唐文是怎样传播出去的，特别是古代的日本、朝鲜，在接受唐代诗文后对本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东亚及欧美各国从前几个世纪直到现在，是怎样来研究唐代文学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一条途径。我相信，本书将是这一行程的起点。

2001年6月于北京丰台区六里桥寓所



## 序 二

罗联添

陈友冰先生现任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兼海峡两岸唐宋文学交流中心主任,治学笃实勤奋,对中国古典诗文精于美学鉴赏,长于评论考辨,写作成绩卓著。出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年》、《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中国古典诗文鉴赏篇》、《中国古典诗文实地考辨篇》、《国策论辨》等专书 10 余种及论文 40 多篇。为推动两岸唐宋文学研究交流,1999 年受台湾“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邀请与资助,来台在中研院文哲所访问半年,本著作即其半年所获的成果。

在台期间,南北奔波,四处访问。听取各方意见,收集许多资料,汇整铢裁,提纲挈领,分列条目,先两岸分论,后作比较,成此巨著,其开创之功,不仅为两岸唐代文学比较研究奠定基础与模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亦足以传之久远。

本著作四章十五节。又再分二十四小节,数十个细目。结构规模宏阔,标题新颖而有创意。两岸阻隔数十年,由于种种原因与影响,思想、观念、论点、研究方法,难免产生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可从本著作章节纲目标题上显现而出。未细读全文,只看标题即知其中内容大略。作者从数以千计论著的头头万绪中,整理归纳,分节目立标题以显示其内容要略,先令读者一目了然,充分表现出作者功力与用心。

本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宏观大体而又考察细微。前者,如将两岸数千种

有关唐代文学论著,分别按时代分段、分期,再分体(诗、散文、小说、敦煌变文等)、分人全面考察、评述,呈现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特征、时代背景、演变发展的趋向,以及盛衰消长的过程。后者,作者以独到眼力,抉发幽微。如指出某著《中国文学史》唐诗部分“实受苏雪林《唐诗概论》直接影响,其框架论述方式,源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采取文学环境、时代背景、作家作品的方式”。某著使用流传三四十年,讲授中国文学史者,几不见为文评论,本著作点出其中之一二,启人省思,甚是可贵。又谓苏雪林《唐诗概论》,现代研究的运用、中西交汇的独特视角影响方瑜《沾衣花雨》、张淑香《李商隐诗析论》的写作,从中见到观念、方法的传承,亦前所未发。至台湾学者抄袭大陆出版论著,教授取学生报告据为己有,部分博、硕士论文,题目内容相似、雷同事,作者或心存厚道,下笔有所保留,着墨不多。

特点之二,是把握要领,提取精华。凡重要论著皆予以论述,方法是把长篇大论缩为小段或简化为三言两语,突显其精髓。如论述台静农 1950 年代《论西汉散文的演变》“以史视角去探讨文学发展与时代思潮的关系”。1960 年代《论唐代士风与文学》,从文化学视野探讨唐代的士人、士风与科举,宫廷朋党的关系。这两篇专论对台湾古典文学研究注重世风和民俗传统的形成,起了导向作用。又论述 1980 年代《佛教故事与中国小说》,称以唐传奇中习见地狱、剑侠、高僧为例,揭示小乘佛教对中国古典小说思想、结构的影响,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又如论王梦鸥《唐代小说》四个论集,称其眼光独到,论证详密,成为经典之作,为台湾古典小说研究确立一套研究路数和操作规范。而于其唐诗学研究指出四个特点是:从初唐入手,重视文本研究、版本比较以正本清源,研究成果能给人启迪,触类旁通。再如论述潘重规研究敦煌学的贡献是:纠正罗振玉、王重民、任二北等若干误断、误校、

误改;研究敦煌文献、文字、声韵;汇集整理资料;培育人材,创办《敦煌学专刊》。此皆含英咀华,揭示要点。对第二代及其后学人著作,亦不吝篇幅,多予称述,抉其要旨,肯定其价值。如称张以仁《花间词论集》在1980年代末唐代文学研究中开拓新领域——研究唐末五代花间词及花间派作家。从名物考订、语义音韵、作品赏析以及词学史等角度,去探幽发微。又如称杨承祖《杜甫用事后人误为史实例》:“立论新颖,别具一格。”分析用典误史实的类型、形成过程与原因。其《闲适诗初论》乃首次探讨白居易的闲适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其特色。它将诗歌从政治功利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感情上最清纯之境。皆简明扼要,指出特色所在。至论述大陆学者部分亦复如此。如评述1980年代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与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两书,均要言不烦。认为前者的价值在资料丰富,论证周严;纠正研究偏向,设想新的研究体式,指示新的研究方式,从大视野来考察时代、社会的影响;首开群体研究之风。肯定后者的贡献在倡导一种研究唐代文学的新的思维方式,开启在广阔文化背景下研究唐诗的先河,皆精言粹语,发人深思。其次如评述钟来因《唐朝道教与李商隐》,揭示钟的见解是:李诗清峭、隐僻、精深风格,与中晚唐崇道风气有关。其解释李诗“鬼道乐”、“金华”等通典含义,乃义山移植道教“秘诀隐文”手法。而前人不明此义,“故都未解释正确”。道教对李商隐爱情诗影响有三:充满仙风道骨,用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种种感受,产生感伤、颓废情绪。论述陈允吉专书《唐音佛教辨思录》,认为是从文化学角度论王维、韩愈、李贺等与佛教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结论,更指出李贺诗中对生死思考比一般深沉,更多哲理意味,与其笃信《楞伽经》有关,简洁明白,予人深刻印象。

特点之三,是平正通达。这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兹举评论1970年代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以见一斑。其大要如

下:郭氏用时间纵线论李白,用内容横剖论杜甫。用两种不同体例有意造成杜不如李。写法不公。论者以为郭投机与善变,事实上,问题更复杂。有趋奉个人审美偏好及喜作翻案文章等各种原因。历史上尊杜者多,郭有意翻案,抑杜扬李,对郭来说,并非善变,倒是一以贯之。又引郭自言: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辩解中略带同情,但亦予以谴责。缺少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的理性。为个人爱好放肆宣泄甚至指名道姓挖苦冯至、萧涤非等没有读过杜甫全集,这就有失学术品格。这真是平正通达而又精彩的言论。

特点之四是平心静气,客观论述。这在学术品格上需要相当修养。唐代文学研究问题向来论争不少,如1970年代台湾有诽韩(愈)案论争,1980年代有新批评论争及其他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辩。大陆学者论争问题更为繁多且争之剧烈。如1960年代有边塞诗之争,1980年代有新方法之争,李白研究之争,李商隐无题诗之争,新乐府运动之争,二十四诗品真伪之争,及其他许多争论皆多以冷静态度,心平气和,客观报道正反两面,不卷入是非,而由读者判断。套用时下流行语,即保留“想像空间”。知之能行,下笔从容,真不容易。

特点之五,为历史存真,深入揭示1950至1970年代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种种情况,于此,海外学者虽有所知,然知之有限。作者以平实笔调勾画出种种令人震惊的事件。例如提到1960年代“用批判与自我批判方式使学者丧失人格自尊和学术上的自信,是最深重最久远的一种伤害”。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即被批为资产阶级学者歪曲社会本质;1962年傅庚生《说唐诗醇美》一文发表,亦被批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家唱滥了的调子”。萧涤非《人民杜甫诗人》“人民”二字被郭沫若诘责和揶揄。事后,萧氏用“不堪回首”来形容当时情景。又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被指责为“夸大了封建帝王的作用”,与“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白话文学史……一

脉相承”，皆平实具体表现当时情况。另外说到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大材小用，在为为人民服务口号下，放下专门研究论题，从事唐代文学知识普及工作，举程千帆、马茂元、陈贻焮、陈迥冬等为例。彼等编注许多唐诗选、诗人诗选，写作不少唐诗人传记。“大学者写普及性作品固大材小用，但因其用心尽力，时有创见，嘉惠影响两代青年学者，在‘文革’后真空阶段填补空白。唐代文学经过摧残后，而能迅速复苏，普及性作品的出版流传，是主要原因。”这些由于作者多亲自闻见，写来特别真切。不仅为唐代文学研究写下真实情况，亦令读者事隔多年，对其时大学者做小工，在受委屈之下而犹尽心尽力，感到钦敬。

本著作引用列举论著篇名非常之多，写作不当，容易成为流水簿。由于下笔轻重得宜，文字朴实流动，故可读性甚高，陈后山诗云“书当快意读易尽”，数十万字读来实有如此之感。叙述各种运动时期学界种种情状，沉重笔调中时带风趣。如谓大陆“1950年代生长学人，由于封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令人兴叹之余，不禁莞尔。

本著作第三章题为“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提出两岸研究相似与共通及彼此优长与缺点。是为本著作重要结论，兹摘要如下：

一、台湾资料较丰富，学术讯息较灵通，选题细密，长于微观思考，散文小说研究成果丰富，道教研究有特色。

二、大陆方面，则是古籍整理成绩卓著，学术问题论争较活泼，研究角度多、覆盖面广，唐五代词研究成果较丰富，多思考历史学、文化学与唐文学关系，研究观念与方法变化较大。两方面优长皆各举实例论证，不作泛泛之谈。又只论长不说短，盖彼之长，即此之短，反之亦然。不赘述，自有其故。

最后一章是“……思考与前瞻”，表达作者期望与卓见。如云张扬学术个性，重铸学术品格；对西学既不盲目搬用，也

不固步自封。凡此皆对症下药。其中不盲用、不自封,表现传统中道思想,尤值得注意。至期望加强两岸学术交流,提出四个具体办法,亦值得重视和参考。

由于两岸论著太多,相关资料太丰富,写作此部 40 余万字大书,自难免有所遗漏,他日若加以增补,则更臻完善。为便于翻检,最好在本著作目录章节外,再增列细目,或于书末附编人名、书名索引。惟此工作须费时日,谨建议以供参考。作者既已不避繁杂、成此巨作,盼望驾轻就熟,往后延伸,再加扩充,写成一部 20 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史。

辛巳年夏罗联添于台北市温州街永嘉楼寓所

## 绪 言

煌煌唐风,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骄人的一章;唐代文学研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中最有华彩的一段。唐代诗文的汇集和探讨,已为唐人自身所乐为和乐道,历经宋元明清学者们的爬梳剔抉、细斟博引的丰厚积累,更成为一座既晶莹又伟岸的丰碑。进入20世纪后,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古代文学研究者,面对世纪之交转型期的动荡,鉴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难再吸引世人的注意,也为了使文学研究从经学、史学中剥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学科,他们开始在文学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上进行改造变革以适应世变,以期建立现代意识的学科体系。但遗憾的是:或是由于后来追求目标的转向,或是由于政治立场的纠缠,或是由于学术思想的变迁,他们都没有对自己发现、倡导的新的研究观念作系统的整理和进一步的探讨,仅停留在启蒙这一步,有的甚至从原来的起点上后退。他们的传人或后起者如郑振铎、陈寅恪、唐圭璋、夏承焘、陆侃如、冯沅君、刘大杰、谭正璧、严耕望、台静农、郑骞、卢元骏、潘重规、苏雪林等,有着学贯中西的丰厚积累,又有着创作研究兼胜的实际体验,本可以凭着自身的优势和站在巨人肩上的优越位置去建构唐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体系,但由于外族的入侵和内战的频仍,面对空空的米袋和烽火连天的三月,在颠沛之中不忘著述,在难以容忍的境遇之中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坚忍不拔地从事名山事业,使中国学术一脉孤悬、赖以不坠,已属相当难能

可贵,遑论学科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949年以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两岸开始分治。大陆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唐代文学研究躬逢其盛,在研究观念、方法上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厚,其进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台湾在19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投入的加大,唐代文学研究的队伍和研究成果明显增大、增多,出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学者和颇有影响的代表之作。1987年解除戒严令和紧随而来的两岸关系解冻,学术交流也开始互通和互动。这时大家才发现:由于近50年的阻隔,出于同一血脉、同一文化背景的两岸学者已变得十分陌生,不但不了解对方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展情况,而且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也各有异趣,研究方向和研究结论也各有区别。但是,中国毕竟只有一个唐朝,只有一个李白和杜甫。出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同一个文化传统,在新的世纪之交叉面临着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因此同仍大于异。50年来的阻隔,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形成了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只有通过加强沟通和交流,才能互相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使唐代文学研究得以拓宽和深化,合力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关于这一点,两岸的学者都有着共同的清醒认识。

这本《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目的就在于总结海峡两岸近50年来,尤其是大陆1978年以后、台湾1970年代以后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寻绎两岸唐代文学研究50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历程,品评其得失,探讨其规律,以期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者乃至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此有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书中对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相似共通之处,各自的优长和不足,也做一些比较和分析,以期两岸学者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也是两岸学者的共同心愿。另外,我们已经跨入的这个21世纪,是一个高科技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典文学研究正在遭遇或已经陷入了种种困境,面临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的价值危机和生存危机。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适应这个高科技、信息化的社会,使古典文学研究这门古老的学科,在理论体系的构



建上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使这门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的知识架构能参与现实文化创造,该书在最后一章对近百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史的演进作了些回顾,对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作了些构想,对两岸学者如何加强合作以应对世变,在应变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完美,也提了些建议和设想。